学术文化

阮元调和汉宋学思想析论

钟玉发

[摘要]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深受汉学皖派由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为学扬汉抑宋，主张“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然而作为当时学术界“山斗”，以科举正途入仕的阮元又不满于汉学家的门户之见，主张调和汉宋之争。这是因为，|方面，清廷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哲学；另|方面，汉学末流日益脱离现实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主张兼采汉宋学的思想，对晚清学术界特别是以林伯桐、陈澧等为代表的岭南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阮元　乾嘉汉学　调和汉宋学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8587 (2004) - 04- 0019- 07

An Analysis of Ruan Yuan's Reconciliation of the Han and Song Schools of Thought

Ruan Yuan (1764- 1849) was a very famous scholar- bureaucrat during the reigns of Qianlong, Jiaqing and Daoguang in the Qing Dynasty. He wa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school of Han Learning in Anhui which originated from Dai Zhen (1723- 1777). Ruan agreed with the scholastic method of finding the Yi- Li from phonetics and etymology. Furthermore, he stood for the Han Learning and restrained the Song Learning in his works. Ruan advocate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goal of applying scholarship to statecraft, but, as the "Mount Taishan and the North Star" of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his time, Ruan Yuan wa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sectarian bias of the Han learners. He worked hard to reconcile the debate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Song schools of thought, because the Song learning served as the official philosophy and the Han Learning increasingly lost contact with reality. Ruan Yuan's effort to reconcile the debate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Ling- Nan school which was lead by Lin Botong (1775- 1845) and Chen Li (1810- 1882).

阮元（1764—1849）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官僚型学者，为学主治古文经学，继承了由戴震开创的由训诂以明义理的考据学风。但他又不囿于门户之见，对宋学表示兼采，并对所谓汉宋之争采取了调和的立场。目前，学术界虽然有人涉及到他的这一学术思想，但大都简单提及，而未展开深入系统的阐发。①故本文试专就此一问题进行讨论，拟探析他作为一个汉学家调和汉宋学的思想、原因以及所产生的影响等，以作引玉之砖。

一

清乾隆年间，由惠栋、戴震所倡导的考据学先后兴起于苏、皖，并且愈演愈烈，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所谓乾嘉考据学派。而当时商业繁荣、文化兴盛的扬州深受这一学风的影响，一时间好古成风，考据学人才辈出。出生于扬州

[收稿日期] 2004- 2- 10

[作者简介] 钟玉发（1963—），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北京 100875

的阮元自幼便受到这种以研治经学为主体的朴学学风熏陶。他曾师从“独立特行之儒”乔春龄、李道南二先生，广泛涉猎了经史百家。及长，与后来成名的凌廷堪、江藩、焦循、孙星衍等相互切磋学问。又直接或间接地受教于顾九苞、李　、刘台拱、任大椿、王念孙、汪中等著名学者，“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②]。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探研，他奠定了坚实的汉学基础，并取得卓越的成就。

在治学精神和方法上，他主要接受和推广了由戴震开派的汉学皖派的学风，确守以训诂发明义理的主张。他说：

> 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譬之越人之语言，吴人能辨之，楚人则否，高、曾之容体，祖、父及见之，云、仍则否，盖远者见闻终不若近者之实也[③]。

于是，其治学兴趣和途径与当时盛行的考据学合流，走上了“治经必通训诂”之路。他还说：“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④]“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⑤]

阮元虽然崇汉信古，但治学思想富有变通的色彩，他对许多汉学家固守汉儒、专治训诂的做法感到不满。在他看来，音训考据只是一种手段，而治经之目的主要在于“闻道”。他说：“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贾义疏之例也。”[⑥]从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他还要求弟子们从古人那里汲取有益的东西，而不为古人所愚弄。

不仅如此，阮元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实际政务工作的官僚，强调“实践”，主张学以致用。他说：

> 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孔子曰：“吾道|以贯之。”贯者，行事也，即与格物同道也。曾子著书，今存十篇，首篇即名“立事”，立事即格物也。先儒论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虚义参之，似非圣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论格物，非敢异也，亦实事求是而已。[⑦]

与之相反，他对理学末流的空疏、虚静之病则予以了批评：

> 佛书内有言佛以寂静明觉为主者，晋、唐人乐从其言，反而索之于儒书之中，得《乐记》斯言（按：指“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及《周易》寂然不动之言，以为相似，遂傅会之，以为孔、孟之道本如此，恐未然也。[⑧]

在他看来，这种以静为主的修养方法，既不是古圣贤经典中的内容，也无益于治世，不能解决经邦济世的任何实际问题。因此，其学术思想中洋溢着扬汉抑宋的色彩。

二

近人刘师培指出：“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惟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⑨]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破除狭隘的门户之见，对当时所谓的“汉宋”之争采取了调和的立场。

道光五年（1825），身为两广总督的阮元在为《学海堂集》所作序中就明确要求教习朱子之学，其言云：

> 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读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⑩]

他还利用自己的名位和财力编印了大量书籍，但他不是凡书必采，而是对激烈攻击程朱之学的书籍进行删节或不载。同时，又通过编书提倡调和汉宋学。阮元为学深受汉学皖派的影响，但是他所编纂的《学海堂经解》中则对戴震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不予收录。其幼时学侣焦循在《雕菰集》中反复对该书表示称赞，而查遍《研经室集》则不见一句推许之词。相反地，却对宋学表示兼采。嘉庆十五年（1810），他在为国史馆总裁时，创立了《儒林传》，其《拟国史儒林传序》中云：

> 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

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

又曰：

> 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

可见，阮元将音训之学视作追求“圣道”的途径，从而得出考据与义理二者不可偏废的结论。所以，此篇之后有其子阮福的按语，云：“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群书采集甚博，全是裁缀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⑪

关于朱子晚年治学思想是否有变化，是明代以来学者们所热衷讨论的话题。阮元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从乾嘉学者（特别是凌廷堪与焦循）所倡言的“以礼代理”出发，指出朱子晚年也有重视“礼”的学术趋向。他首先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接着称赞道：“此朱子一生拳拳于君国大事，圣贤礼经，晚年益精益勤之明证确据。”那么，“以礼代理”的学术意义又何在呢？他说：

> 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故宜忠宜孝即理也。然三代文质损益甚多，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能争矣。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⑫

另一方面，道光六年（1826），宋学家方东树著成《汉学商兑》，对阮元等汉学家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有人认为方氏之说纯属门户之争，不甚可取。但从事后阮元的表现来看，应该说受到了触动。道光八年（1828）春，已调任云贵总督的阮元受广东学者之托，为《学蔀通辨》一书作序时明确地表现出调和汉宋学的立场。其序文云：

> 此书专辨朱、陆异同，推尊朱子。《四库书提要》曰：“朱、陆之书具在，其异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辑朱子晚年定论，颠倒岁月之先后，以迁就其说，固不免矫诬。然建此书痛诋陆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亦未能平允。”元于东园清暇，重加披阅，尊《提要》之言，手将“病狂失心”等语加以删削而还之。盖除此所删，则皆表彰正学之要言，即有过激之论，无非欲辨朱子之诬。粤中学人，固当知此乡先生学博识高，为三百年来之崇议也。⑬

后来，他又说到：

> 岭南学人惟知尊奉白沙（陈献章）、甘泉（湛若水），余于《学海堂初集》大推东莞陈氏（建）《学蔀》之说，粤人乃知儒道。东莞山长李绣子（黼平）送行文云，五百年来儒不入释者，芸台先生而已。⑭

关于方东树对阮元学术思想的影响，郑福照曾有过论述，其言云：

> 阮文达公初与先生论学不合，晚年乃致书称：“先生经术文章信今传后”。又极赞所撰《三年丧辨》，谓其“解中月而禫真解，创获实前人所未及。其言未出，世莫能知；其言既出，世莫能废。有功名教，为宇宙必不可少之言。”⑮

如果说郑氏之言可能有为同里先学曲护、不足凭信的话，那么与阮元关系密切的福建学者陈寿祺（1771—1834）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阮元等人的确感到当时社会风气日下而汉学又无补于事，因而主张兼采汉宋。他说：

> 仪征抚部夫子、金坛段明府若膺寓书来，亦兢兢患风俗之弊。段曰：“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故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而况所谓汉学者，如同画饼乎？”抚部曰：“近之言汉学者，知宋人虚妄之病，而于圣贤修身立行大节，略而不谈，以遂其不矜细行，乃害于其心其事。”二公皆当世通儒，上绍许、郑，而其言若是……⑯

陈氏此文作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春三月，当时段玉裁 80 岁，阮元 52 岁，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与方东树所说极为相似。因此，说阮元晚年认可了方氏之说应为不差。

其实，就阮元个人的治学兴趣而言，虽偏重在对经书的考据之上，但实际上他很早以前就对所谓门户之见表示不满。嘉庆三年(1798)，35岁的阮元著成《曾子十篇》注释，凡易三稿，慎之又慎。年谱引阮元说：

> 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书则愈精，发明圣贤言行之书甚少，否则专以攻驳程朱为事，于颜曾纯笃之学未之深究。兹《注释》五卷，不敢存昔人门户之见，而实以济近时流派之偏也。[17]

阮元明白指出当时有所谓考证的流派。这一流派，既不满意程朱之学，而且存有“门户之见”。于是，他注释曾子，意在调和汉宋，以义理济训诂之偏。

阮元之弟阮亨在《瀛舟笔谈》卷七中，曾就此评论曰：

> 此中发明孔曾博学、难易、忠恕等事，与《孝经》、《中庸》相表里……故所撰之书，当以此五卷为最精。[18]

关于阮元治学成就与调和汉宋学思想，龚自珍曾有过总结和评价。道光三年（1823），阮元60岁生日时，龚自珍在评价了他在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以及掌故之学等方面的成就后，指出：

> 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19]

斯言诚为确论。

三

阮元以其对经学的研究和编刻书籍、创办书院等而被人们推认为乾嘉汉学的殿军和汉学之“护法神”。但他同时又不囿于门户之见，对所谓汉学和宋学的争论采取了调和的立场。

首先，清廷虽不废汉学，但一直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哲学，并沿用明制，用八股科举取士，以朱子对“四书”的注解为标准解答。阮元等也以所谓科举正途入仕，自幼就受到理学的熏陶，他说：“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20]

其实，汉学和宋学本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前者属于学问范畴，而后者则属于思想意识领域。即使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也都是以程朱理学为起点和基础的，因此虽然为学以汉学为主，但又大多对宋学表示了兼采的态度。吴派首领惠栋的父亲惠士奇红豆山斋楹帖就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戴震的老师江永则著有《朱子近思录集注》等，而戴氏本人早年也说过“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21]以至戴震谢世后，其弟子段玉裁主张将其师配享朱子祠。江藩虽从学术史的角度著成《汉学师承记》，并引起了龚自珍的“不安”和方东树的激烈反击，但他本人不仅不反对朱子之学，甚至对所谓朱、陆之争也表示不同意，认为应该持学术之平和兼采众家之长。

其次，道咸以来，国是日非，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王朝走过了它的鼎盛时代，开始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从内忧方面看，爆发了苗民和白莲教大起义等；而在外患方面则有来自海上的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势力的炮舰的威胁和鸦片的侵扰。此时，清朝官僚队伍日益腐化，贪渎公行，道德沦丧。而由于八股科举取士制度日趋徒具形式化，使得人才枯竭，出现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的状况[22]。而鸦片泛滥则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陈寿祺曾曰：

> 寿祺尝深思天下事重有忧者，如鸦片一物，夷人贩运，既以戕中国之人，又以耗中国之财，用心叵测，流毒无穷。计二十年间，天下之甘其鸩而倾其赀者，奚啻累千亿万编。田民陷之十二三焉，庠序陷之十四五焉，纨绔陷之十八九焉，冠弁陷之十一二焉，其势方日炽而未有止。不识再复二三十年，其为戕耗又将何若？[23]

陈澧“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24]此话颇有道理。以所谓乾嘉汉学而言，使得士人大多埋头于远离现实的故纸堆中，陷于餖飣琐碎，“擘绩补苴，不足与言学”的地步。梁章钜指出：“今之墨守汉学者，往往愈引而愈晦，抱残守阙，远证冥搜，每一编成，几于秦延君之释尧典二字二十万言，汉博士之书驴券，三纸尚未见驴字。”[25]另一位学者夏炯则点名批评阮元及其训诂之学：

> 迩来训诂之家，咬文嚼字，何益身

心，何裨家国，好为无用之辨，徒长虚骄之气而已……至戴东原、钱竹汀等，谬为狂言，谓非训诂则不能通义理，一时学者从而和之。凌次仲之复礼、程易田之论学、阮芸台之论语论仁，遂竟以训诂为义理之所出，而居之不疑，天下聪颖特达之士尽为训诂所牢笼而不觉。[26]

而姚莹则认为汉学因反对宋儒导致人心坏、媚夷人：

> 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奇耻大辱，岂非毁讪宋儒诸公之过哉。[27]

至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书林扬觯》等激烈攻击阮元等汉学家固然带有门户之见、卫护名教的色彩，可是，如果考虑到他批判汉学与现实乖离、无益于国计民生等实际情况的话，那么也许他自有一些道理。比如，他在《汉学商兑》"序例"中云：

> 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欲咀嚼。

又著《书林扬觯》"序纂"云：

> 藏书满家，好而读之，著书满家，刊而传之，诚为学士之雅素。然陈编万卷，浩如烟海，苟学不知要，敝精耗神。与之毕世，验之身心性命，试之国计民生，无些生益处。身死之日，徒以此书还之于世，留赠后人，与好货财、置服器何异？此只谓之嗜好，不可谓之学……[28]

其实，方氏本人也认可汉学的价值，只是"窃以为物太过则其失亦犹之不及焉……今日之汉学，亦稍过中矣。"因此，他希望当时学界领袖阮元能够"正其极，抚其倾，庶乎有以挽太过之运于未弊之先，使不致倾而过其极，俾来者有以考其功焉。"[29]

通过以上考察不难发现，虽然乾嘉考据学在文献整理乃至古圣贤义理发明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其末流流于形式、远离现实，因此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阮元等人调和汉宋之争，力图"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并试图以此兼综这两种学术的各自优点和扬弃其空疏与"华而非朴"的缺点，并因此对晚清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阮元因乾嘉汉学盛极而衰和脱离实际而对汉宋之争采取了调和的态度，试图集两者之长而去其短，不仅赞成"以礼代理"、抑王扬朱，而且力主"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他的这一学术思想通过创设书院以及著述等对晚清学术特别是岭南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调补云贵总督。其后任卢坤一如旧法，继续扶持学海堂。卢坤于道光十四年（1834）订立的《学海堂课章程》中既有《十三经注疏》、《史记》等，也有《朱子大全集》。

陈澧在粤华书院读书时，常与林伯桐（1775—1845）等师友交游、论学。后者是阮元识拔的岭南著名学者，于1826年任学海堂首任八位学长之一，好为考据之学，宗主汉儒，而践履服膺朱子。[30]他忠实地执行阮元所制订的学海堂规制，为学注意调和汉宋。[31]他根据经学发展史客观地评价朱子学，把郑玄、朱熹并列为经学之宗。"夫训诂有郑君，义理有朱子，此经部之宗也。"[32]又认为：

> 朱子之学，实学也，凡所为读书穷理，居敬持志，循循然莫不有规矩。大约根柢六经而参稽百氏，必欲得义理之至是而行之，其于孔子所谓好古敏求，孟子所谓博学详说者，实相表里，是以昭代大儒陆清献公有言，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光。学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当求入其堂奥，不当又自辟门户。[33]

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读朱子书，人人知此意，则实事求是，尊其所闻，何事断断于汉宋之界者？"[34]

广州籍学者樊封（1789—1876）也曾调补学海堂学长（1875）。他接续阮元等人的话题

撰文阐述了学海堂之创立对于岭南学术的意义，认为岭南学风过于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因而认为应该抑王而并扬郑、朱：

粤人濡染阳明绪余，祖法乎良知之说，与康成、晦庵相违，视六籍为支离，薄训诂研索为末务。士子稍解握管，辄高谈妙论，凡目所未见之书，辄指为伪册。父诫其子，师训其徒，牢不可破，空疏无据，流弊三百年。公建此堂……盖欲使稽古之士良秀者崇实学而得所依归、鲁钝者知穷经之法不在高深元远。惟能通其古义，自足取益，不致以有用之才放心于冥漠拘迂之地，驰情于浮华词藻之间。”㉟

而尤其广为人知的岭南学者陈澧则更主张兼采汉宋。陈澧（1810—1882），字兰甫，学者称东塾先生。23 岁时中举，但六应会试不中，为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老为菊坡精舍山长。生平读书，心有所得，即手录之，积数百册。汉学宋学，能会其通。年轻时，嗜好小学、音韵、天文、地理、法律、算术、古文等。而中年以后，学术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道光二十四年（1844），35 岁，会试不第，出都，与李能定同行：

又言：“少时只知近人之学，中年以后知南宋朱子之学，北宋司马温公之学，胡安定之学，唐韩文公之学，陆宣公之学，晋陶渊明之学，汉郑康成之学。再努力读书，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学欤。”㊱

明确地表现出兼采宋学的立场。考陈氏之所以持此论，与受到阮元的直接影响息息相关。诚如他本人所论：

阮文达公《诗书古训》，后之讲经学者当以为圭臬，此真古之经学，非如宋以后之空谈，亦非如今日所谓汉学之无用也。我辈宜崇尚之。㊲

他对当时所谓汉学流弊的抨击几与方东树《书林扬觯》相类：

今时学术之弊：说经不求义理，而不知经……好诋宋儒，不读宋儒书；说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凿牵强；不读史；叠木架屋。㊳

又说：

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㊴

堪称陈澧代表作的《东塾读书记》（原名《学思录》），草创于 1858 年。书中对阮元之学极为推崇，也由此可见他深受阮元的影响。其中第 13 章与第 15 章专论郑玄和朱熹的学说，不仅在形式上表示并尊两者，而且进一步说道：

著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此书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至宋以后，有宋元明学案之书，则皆略之。惟详于朱子之学，大旨在不分汉宋门户。㊵

也有人认为，陈氏更擅长考据之学，但即便是其考据学著作也贯穿着调和汉宋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汉儒通义》一书，采两汉经师义理之说，分类排纂，欲与汉学、宋学两家共读之。㊶

他还通过具体事例论证朱子对郑玄之学表示赞同，汉宋两家本不应有异议，其言曰：

《中庸》“仁者，人也。”郑注云：“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朱子《与吕伯恭书》云：“‘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于何书？疏中亦不说破，幸以见告。所谓‘人意相存问’者，却似说得字义有意思也。”按郑君之注，朱子称之，汉学宋学两家可无异议矣。㊷

在岭南诸学者中，陈澧被公认为是代表性人物。虽然近人章太炎等并不首肯陈氏之调和汉宋之论，认为那是犹如从千匹马上各剪几根细毛，偶有相类者，但此马仍非彼马。但钱穆等学者却予以了不遗余力的推崇。持论虽有异，但都无法否认陈澧的确是受到阮元所倡导的学风的影响。也由此可见，阮元在晚清汉宋调和之学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而又由于处于悲风骤起、大乱将至的鸦片战争前夕，学术与政事如何结合成为这位清廷重臣和学界泰斗不得不思考和应对的问题。他不仅提倡治汉而兼宋，而且对于正在崛起的讲求“微言大义”和

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也表示推许，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兴起和光大。

---

①分别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540—54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今人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阮元》，第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和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第346—34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②阮元《任子田侍御弁服释例序》，《研经室一集》卷11，第243页，中华书局1993年。

③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7，第547页。

④阮元《论语一贯说》，《研经室一集》卷2，第53页。

⑤阮元《研经室集自序》。

⑥阮元《焦里堂循群经宫室图序》，《研经室一集》卷11，第250页。

⑦阮元《大学格物说》，《研经室集》卷2，第55页。

⑧阮元《性命古训附威仪说》，《研经室一集》卷10，第229页。

⑨刘师培《扬州前哲画像记》，《左庵外集》卷20，第189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⑩阮元《学海堂集序》，《研经室续四集》卷4，《研经室集》，第1077页。

⑪阮元《研经室一集》卷二，《研经室集》，第37—38页。

⑫阮元《书东莞陈氏学　通辨后》，《研经室续三集》卷3，第1062—1063页。

⑬阮元《研经室续三集》卷3，　《研经室集》，第1063—1064页。

⑭阮元《小暑前坐宗舫船游北湖南万柳堂宿别业诗》自注，《研经室再续集》卷6，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⑮郑福照《清方仪卫先生东树年谱》，第3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⑯陈寿祺《孟氏八录跋》，《左海文集》卷7，道光刻本。

⑰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雷塘庵主弟子记》卷1，《阮元年谱》，第18页，中华书局1995年。

⑱阮亨《瀛舟笔谈》卷7，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⑲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第274页。

⑳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7，第547页。

㉑戴震《与方希原书》，《戴震文集》卷9，第144页，中华书局1980年。

㉒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

㉓陈寿祺《上宫保尚书仪征公书》，《左海文集》卷5，道光刻本。

㉔陈澧《与胡伯蓟书》，《东塾集》卷4。引自朱维铮主编《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第34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㉕梁章钜《退庵随笔》卷14，光绪元年福州梁氏刻本。

㉖夏炯《与方植之丈书》，《夏仲子集》卷6，民国十四年铅印本。

㉗姚莹《复黄又园书》，《东溟文外集》卷1，清刻本。

㉘方东树《书林扬觯》，中国书店民国十四年刊本。

㉙方东树《上阮芸台宫保书》，《仪卫轩文集》卷7，同治七年刻本。

㉚《清史稿•儒林三》卷482。

㉛林伯桐《学海堂志•课业》。

㉜林伯桐《浚仪王氏困学纪闻跋》，《修本堂稿》卷3，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㉝林伯桐《书东莞陈氏学　通辨后》，《修本堂稿》卷3。

㉞林伯桐《朱子不废古训说》，《修本堂稿》卷2。

㉟樊封《粤秀山新建学海堂铭》，《学海堂集》卷16，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㊱汪宗衍《陈东塾（澧）先生年谱》，第33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㊲杨寿昌《陈兰甫先生遗稿》，《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三期，1932年6月。

㊳默记《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学思录序目》，《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7月。

㊴杨寿昌《陈兰甫先生遗稿》，《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三期，1932年6月。

㊵陈澧《复刘叔　书》，《东塾集》卷4，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刊本。

㊶陈澧《复王倬甫书》，《东塾集》卷4。

㊷陈澧《中庸“仁者，人也”解》，《东塾集》卷2。